

甯粵對峙下的國立中山大學抗日救亡運動（1931—1936）

作者：蕭勝文

指導老師：曹天忠

摘要

國立中山大學是國民革命的產物，承擔著孕育革命的民族文化與培養革命的建設人才以挽救中國的重要使命，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價值和地位。在局部抗戰中，相對遠離日本侵略主戰場的中山大學被日本人稱為“抗日大本營”，不僅激勵了中大師生以此為旗幟砥礪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而且反映了中大在此期間抗日救亡工作的種種表現和成績。在既往的研究中，學界多以革命史的理論與方法將抗日救亡運動劃分為九一八事變、“一二·九”運動和七七事變三次高潮論述，凸顯了中共和左翼進步力量在運動中的引領作用，自有其合理性。但是，既有研究未能合理解釋中山大學在 1935 年初即被稱為“抗日大本營”的緣由，也未充分發掘以學校為主體的抗日工作貢獻，且忽視了寧粵對峙期間“倒蔣抗日”政治旗幟背景下對中大抗日活動的深刻影響。因此，在革命史觀指導下形成的豐富成果基礎上，堅持實證史學的本位，深入挖掘和解讀校內外史料，以寧粵關係變遷為視角梳理中山大學抗日救亡運動的演變歷程，實證中大作為“抗日大本營”的名實關係，就成為很有必要。

1931—1936 年間的寧粵對峙是中國局部抗戰史中不可忽略的國內矛盾，國民黨西南元老派領袖鄒魯執掌的中山大學成為“抗日大本營”與此情勢密切相關。1930 年底中大爆發的“拒金迎戴”易長風潮已有粵省與中央對抗意味，可謂寧粵對峙前奏。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西南方面為借抗日之名逼蔣介石下臺而積極引導群眾抗日，中大的抗日救亡運動亦由此蓬勃興起，成為西南學界抗日的領頭羊。鄒魯重長中山大學之後，以“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作辦學宗旨，堅持“讀書、救國、抗日”的新方針，通過建設石牌新校為中大注入救國的新使命和愛國的新精神，從整頓學風、革新教育、引導科研、善用總理紀念周等多方面進行“教育救國”的實踐。在此期間，中大高舉西南當局的“抗日反蔣”旗幟，始終佔領抗日救亡輿論高地，使校內“抗日空氣”相當濃厚，獨樹一幟。正因如此，日本人才將中大冠以“抗日大本營”的稱號。但是，隨著華北危機的逐步加深、西南實力派與元老派的分裂，鄒魯逐漸倒向南京方面，中大這座“抗日大本營”則在的“一二·九”運動後被迫逐漸隱退，未輕易介入兩廣事變，保持了自己的立場。通過轉換研究的視角，本文重構了寧粵對峙時期中大抗日救亡運動的史實本事，證實了中大“抗日大本營”的特殊形成背景和各種抗日愛國行動。寧粵對峙提供了抗日的政治依據和相對寬鬆環境，是中大成為“抗日大本營”的關鍵外部因素；鄒魯是西南政界重要人物，他重長中大期間的諸多舉措契合了抗日救國的主旨。二者共同影響了中大抗日救亡運動的進程與取向，使其具有獨特的內涵與價值。

關鍵字：甯粵對峙 國立中山大學 鄒魯 抗日大本營